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

謝 明 良*

【摘要】本文是嘗試將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從全盤接受中國陶瓷，至將日本國產陶瓷導入鑑賞對象之文物鑑賞觀等文化史課題，置於文化圈中區域比較的視點予以省思。結論認爲，所謂的「和樣」只是做爲內核的「唐樣」向外緣擴張發展出的區域樣式，而非當時日本地區所刻意營造出的要和中國陶瓷區別或對抗的風格要素。另外，本文還從室町將軍家的裝飾道具與中國皇帝賞賜品內容雷同等情形推測，室町將軍家崇尚唐物之風其實是想借由與明代的冊封體制，來達到其篡奪王權的計劃，也因此包括陶瓷在內的由中國皇帝賜予的中國文物，除了可供鑑賞之外，同時具有象徵威權的功能。

關鍵詞：中國陶瓷　室町時代　桃山時代　和樣　唐樣

一、前　言

以中國區域的帝王年號而言，十五至十六世紀兩百年間正值明代永樂(1403-1424 年)至萬曆(1573-1615 年)前中期，而就日本區域的時代劃分來說，則是跨越室町(1359-1573 年)和桃山(1573-1614 年)兩個時期。

一般認為，尊崇以中國為主的各種物資而被戲稱為「唐物萬能」的室町時代之文物鑑賞觀，到了後期至桃山時代因受到日本國內侘茶道等影響而孕育出的美學品味有顯著的不同，故日方學界多傾向認為，室町後朝至桃山時代是日本從接受中國式的鑑賞過渡發展至具有自身品味好尚的轉型期。就日本陶瓷史的研究而言，既有將日本陶瓷模倣中國陶瓷時所羼入的日方造型或裝飾要素視為「和樣化」的表現之一般論述；①於茶道陶瓷的鑑賞和使用方面，則是強調天正十四年(1586 年)《山上宗二記》之「捨棄唐物」等記載，②甚至主張其時

＊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教授

① 楢崎彰一，〈日本陶磁における唐様と和様〉，《東洋陶磁學會會報》25 (1995)，頁 1-3。

② 山上宗二(1544-1590 年)，《山上宗二記》：「ヲテ茶ノ湯ハ唐茶ノ湯スタリ，當世ハ高麗茶ノ湯，瀨戶茶ノ湯，今燒ノ茶ノ湯迄也，形サヘ能候ヘハ數奇道具也」，收入：千宗室編，《茶道古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分窯業已從單純的唐物模倣，逐漸發展出具有日本獨特面貌的所謂「和樣」。③如此一來，「和樣」似乎就成了是與中國工藝品所呈現出的「唐樣」相抗衡對立的一種樣式。

我無意否認「和樣」的存在和成就，但若就東亞的窯業交流史及東亞區域所生產的陶瓷作品而言，使用漢字的中日韓三地應可納入同一個陶瓷文化圈。因此，本文即是嘗試將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方人士從全盤接收中國陶瓷(唐物)，至將日本國產陶瓷(和物)導入鑑賞對象之文物鑑賞等文化史課題，置於文化圈中區域比較的視點予以省思。在此一觀看角度之下，「和樣」會不會只是做為內核的「唐樣」向外緣擴張發展出的區域樣式，而非當時日本地區所刻意營造出的要和中國陶瓷區別、對抗的風格要素？

為了達成以上所擬定的課題，有必要先簡略地梳理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區域出土、使用中國陶瓷的大體情況，進而結合文獻記載觀察各階層日用陶瓷的具體種類及其和做為鑑賞對象之陶瓷的異同。其次，本文亦將以室町足利將軍府收藏的中國陶瓷和茶會記等文獻資料為線索，④考察日本之中國陶瓷鑑賞觀的變遷以及具體的鑑賞方式。

二、日本出土的十五、十六世紀中國陶瓷

儘管已發掘的日本十五至十六世紀(即中世後期)遺跡個數龐大，其發掘報告書又極難尋得，不過我們仍可經由日方研究者對於室町時代出土陶瓷之編年或產地分析等專論以及展覽圖錄，得以初步掌握遺跡出土中國陶瓷的大體情況。特別是從近年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彙整編集的日本全國考古遺跡出土陶瓷調查資料，可以輕易得知絕大多數的日本十五至十六世紀遺跡均伴隨出土有中國瓷器。⑤其次，七十年代愛知縣陶磁資料館針對日本一都二府十八縣總

全集》第 6 卷(京都：淡交社，1978)，頁 64。

③ 林屋晴三，〈茶の湯の場における請來陶磁と和物陶磁の交流〉，《東洋陶磁》25 (1996)，頁 41。

④「茶會記」是記錄茶會地點、日期、與會者、抹茶種類及所使用茶道具等之記事錄。其又可分為參與他人茶會的所謂「他會記」見聞記錄，和記載自身所舉行茶會的「自會記」備忘錄。

⑤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本出土の貿易陶磁》西日本編 1-3 冊；東日本編 1-2 冊(千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計八十餘處城館遺跡出土陶瓷所進行的研究展示，同樣表明中國陶瓷於日本中世紀後期所扮演的積極角色。⑥

就日本全國中世後期遺跡出土中國陶瓷的種類而言，主要包括青花瓷、青瓷、和白瓷等三大類，偶可見到黑釉和低溫三彩以及於白瓷釉上施加紅綠彩繪或貼飾金箔等製品。⑦遺跡分布範圍涵蓋九州、中國、四國、近畿地區，中部、關東地區、東北地區甚至於北海道。具體而言，從南部九州出水郡放光寺遺跡⑧至京都伏見城跡(文祿元年(1592 年)豐臣秀吉下令建造)、⑨瀨戶內海富山城跡(毀於永祿十三年(1570 年)宇喜多直家)，⑩關東東京八王子城跡⑪東北浪岡城跡，⑫甚至於北海道上之國勝山館跡⑬等均出土了以青瓷、白瓷和青花瓷為基本組合的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國陶瓷。也就是說，上述橫跨北緯 32 至 41 度涵蓋日本南北遺跡所見中國陶瓷種類組合頗為類似。其次，《蔭涼軒日錄》延德四年(1492 年)4 月 26 日條載「家具驚目，大半白磁、青磁，染著等諸色有之」⑭也說明了其時中國陶瓷輸日的主要種類分別是白瓷、青瓷和青花瓷。

就城跡出土中國陶瓷的器形而言，以各式碗和盤等日常飲用器為主，偶可見到用於茶道、花道和聞香之爐、盒、瓶、罐、或碗托等作品。各遺跡中國陶瓷均與日本國產瓷共伴出土。以房總地區為例，和愛知縣瀨戶美濃燒共出的城跡頗多，兩者比例約為 3~5:1，即中國陶瓷約為日本陶瓷的 3 至 5 倍。⑮其次，小野正敏曾就使用、消費層面，將遺跡出土陶瓷大致類成【a】日常必用品(煮炊、貯存、飲食、燈等)；【b】茶花香(盒、爐、瓶等)；和【c】與職業生產相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1993、1994)。

⑥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近世城館跡出土の陶磁》(愛知縣：圖錄刊行會，1984)。

⑦ 長谷部樂爾，〈日本出土の元明時代の陶磁〉，收入：《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東京美術，1978)，頁 129-140。

⑧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同註(5)（西日本編 3)，頁 373。

⑨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同註(6)，頁 99-100。

⑩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同註(6)，頁 124-125。

⑪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同註(6)，頁 11-14。

⑫ 工藤清泰，〈浪岡城跡出土の陶器〉，《貿易陶磁研究》4 (1984)，頁 57-64。

⑬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同註(5)（東日本編 1)，頁 37。

⑭ 《蔭涼軒日錄》，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137 (東京：名著普及會，1987)，頁 2270。

⑮ 小野正敏，〈房總の城館出土中世陶器の問題〉，《千葉史學》18 (1991)，頁 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的器物(如寺院跡的宗教道具)等三類。⑯應予留意的是，其中包括了非民生日用的可能做為鑑賞對象的茶花香道具。

儘管日本中世遺跡出土陶瓷的精細編年還未臻完善，但由於部份城跡之興廢年代於文獻中記載甚詳，故日本方面有不少研究者嘗試結合中國區域等相關考古資料進行年代排序，其中又以龜井明德、⑰森田勉、⑱小野正敏、⑲上田秀夫、⑳北野隆亮㉑等人的編年方案較常為學界所引用。如果總結歸納上述諸學者的見解，則似乎可將室町時代出土中國陶瓷區分為：I 期(十五世紀前半至後期)、II 期(十五世紀後半至十六世紀前半)、III 期(十六世紀前半十六紀後半)、IV 期(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之慶長年間(1596-1615 年))等四期。就各期出土陶瓷的種類而言，I 期以青瓷和白瓷為主，後期始出現較多的青花瓷；II 期除青瓷、白瓷之外，青花瓷和白瓷的數量激增；III 期青瓷碗漸趨少，以青花碗、盤為主，並見有白瓷菊花盤等新器種；IV 期以青花瓷為主，青瓷碗消失，出現了所謂的卡拉克瓷和漳州窯器。

雖然考古遺跡出土情況已經顯示室町時代人們已經普遍地使用中國陶瓷，而其使用階層除可經由遺跡性質的觀察予以釐清之外，文獻記載往往更為具體和生動，並可與考古資料相互發明檢證。本文所蒐集到涉及階級陶瓷器用之相關文獻，可大致區分為農民、中下階層民，以及寺院、大臣等幾個階層。以下略述其梗概。

(1) 《東寺百合文書》記載：寶總二年(1450 年)，農村平民百姓若狹國泉大夫，因事遭官方緝捕沒入充公的財產中，包括有牛、犁和「茶碗」。㉒

---

⑯ 小野正敏，〈城館出土の陶磁器が表現するもの〉，收入：石井進等編，《中世の城と考古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1)，頁 11。

⑰ 龜井明德，〈日本出土の明代青磁碗の變遷〉，《鏡山猛先生古稀記念文集》(1980)，收入：同氏，《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 298-338。

⑱ 森田勉，〈14－16 世紀の白磁の分類と編年〉，《貿易陶磁研究》2 (1982)，頁 47-54。

⑲ 小野正敏，〈出土陶磁よりみた 15、16 世紀における畫期の素描〉，《MUSEUM》416 (1985)，頁 20-28。

⑳ 上田秀夫，〈14－16 世紀の青磁碗の分類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2 (1982)，頁 55-70。

㉑ 北野隆亮，〈15、16 世紀の貿易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0 (1990)，頁 51-65。

㉒ 網野善彥，〈中世民眾生活の一側面〉，收入：《生產技術と物質文化》日本歷史民俗信仰論集 2 (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頁 3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同上《東寺百合文書》又載：文明十九年(1487 年)，中下層民左衛門太郎因殺人罪嫌而被查封的財產中，有價值二十文的「茶碗」一件。 ㉓

(3)《大音文書》記載：1550 年前後主要從事漁撈，間參與和海賊作戰的刀禰階級大音氏的財產目錄中的陶瓷，計有：「茶碗皿大 10」、「白茶垸皿小 20」、「染付小皿 20」、「染付なます皿 20」、「天目台付 2」、「青皿 10」、「すし口皿 10」。 ㉔

(4)《瀧合寺校割帳》記載：天文年間(1542 年)，上層階級瀧合寺財產帳目有：「染付三束」、「白一束」、「小染付二束」。 ㉕

(5) 三条西實枝(1511-1579 年)著《三內口決》器之條載：「木具。土器。面向之參會、會席、祝儀ハ必用之候。… 青磁。或白茶碗。大臣朝夕之器也、一切塗物不し用之(中略)、大臣規模此分二候」。 ㉖

上述記事中(1)、(2)所見茶碗很可能屬中國製品，而(3)之「白茶垸皿」、「染付小皿」、「青皿」則分別指白瓷、青花瓷和青瓷，此無疑屬於中國製品，後者陶瓷種類基本符合遺跡出土標本。值得留意的是，此刀禰層的財產中還包括有「天目台付」，即附帶可能是木漆托座的黑釉茶碗。(4)瀧合寺院財產所見青花瓷和白瓷，也應是中國製品。此外，寺帳中亦見有屬於酒器的「唐瓶一雙」，佐藤圭認為此或即中國的青白瓷梅瓶？㉗(5)的性質與(1)-(4)不同，但透露出極為重要的訊息，即縱如大臣般高階層人士於正式的宴會是使用木器和無釉的瓦器，而自中國輸入的青瓷或白瓷只是非正式的日用器皿。

另一方面，個別保存、發掘狀況良好的遺跡出土陶瓷亦可反映各階層陶瓷的使用情形。關於這點，我們可以福井縣的「一乘谷」為例予以說明，因為該遺跡的遺留狀況和發掘工作的精細度都頗有可觀之處。一乘谷是戰國大名朝倉孝景於文明初年(1469 年)在越前建設的首都，毀於天正元年(1573 年)的戰火，故遺跡出土遺物多屬廢棄品，頗能忠實反映當時生活景況。遺跡各使用空間單位大多能予以復原，不僅確認了寺院、醫生或漆木工、鑄造業等住居遺址或作

㉓ 網野善彥，同上註，頁 338-339。

㉔ 網野善彥，〈北國の社會と日本海〉，《海と列島文化》第一卷(1990)，頁 21。

㉕ 佐藤圭，〈瀧谷寺校割帳と一乘谷出土遺物－中世の家財道具について－〉，收入：《北陸社會構造の史的研究》(1989)，頁 4。

㉖ 野場喜子，〈中世の繪畫作品にみる中國製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5 (1995)，頁 116。

㉗ 佐藤圭，同註(25)，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坊遺跡，同時成功地復原了戰國大名朝倉氏的宅邸，後者包括廚房和會所、主殿、庭園等各項設施。各不同遺跡出土陶瓷組合同中有異。即城市民、武士居宅或大名朝倉館均出土了中國和日本國產瓷，但朝倉館所出日本無釉瓦器則佔有突出的比例，高達同遺跡出土陶瓷全數的九成以上。㉘其次，市鎮出土物中包含不少茶花香道具，如 1987 年第 57 次調查時就確認了川合殿之武家居宅水井出土有所謂的呂宋壺、茶碾、黑釉碗等茶道具。值得留意的是，朝倉館址更出土了屬於宋代的定窯白瓷和十一至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等作品。㉙小野正敏認為，戰國大名遺跡陶瓷的共通處是出土有使用於「座敷飾」的青瓷花瓶、香爐、白瓷梅瓶和四繫壺等，該類做為「威信財」的道具多屬宋元時期的古物，表明戰國時期的權貴努力追求鐮倉時期的「唐物」，同時繼承了「將軍御成」、「式三獻」等武家禮儀。㉚該一看法和過去矢部良明將宋元時期輸日的白瓷四繫罐、水注、梅瓶戲稱為「三神器」，認為其為武家文化的象徵之說法有共通之處。㉛

三、足利將軍府的陶瓷收藏與鑑賞

有關室町時代將軍府對於中國文物的鑑賞與收藏，以《君台觀左右帳記》的記載最為重要。該書有能阿彌和其孫相阿彌等兩系列版本，其中又以文明八年(1476 年)能阿彌筆(群書類從本)和永正八年(1511 年)相阿彌書(東北大學本)等兩種版本最常為學界所引用。㉜內容主要是記載將軍家藏中國畫作以及書院

㉘ 小野正敏，《戰國城下町の考古學》(東京：講談社，1997)講談社選書メチエ 108，頁 103-113。另外，有關無釉瓦器的性質，可參見：吉岡康暢，〈“カワラケ”小考〉，《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74 (1997)，頁 125-129。以及[illegible]田晴子，〈文獻からみた中世の土器と食事〉，《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71 (1997)，頁 473-495；野場喜子，〈大饗の食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71 (1997)，頁 517-528。

㉙ 小野正敏，同註(19)，頁 27-28。

㉚ 小野正敏，〈戰國期の權威と富を象徵する貿易陶磁器〉，收入：《貿易陶磁研究會關西大會資料集》(1998)，頁 7。另，佐藤豐三，〈御成記〉，收入：《茶の湯の成立》茶道聚錦 2 (東京：小學館，1984)，頁 257-261。

㉛ 矢部良明，《日本陶磁の一萬二千年》(東京：平凡社，1994)，頁 213-214。

㉜ 有關《君台觀左右帳記》各版本的介紹，可參見：谷晃，〈『君台觀左右帳記』の成立に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裝飾和茶道具，並給予等第品評。由於相阿彌曾增補能阿彌所著述的部分內容，故書中那一部分確屬能阿彌所撰？目前已不得考。[33]同時其內容又和近年發現的永享九年(1437 年)能阿彌筆錄之《室町殿行幸御餝書》多有重疊，後者係記錄了將軍威權達到最高峰之六代將軍足利義教於御花園天皇行幸時，向天皇展示的陳設於室町殿(花御所)庭院南北會所的裝飾鑑賞道具。[34]以下所引用《君台觀左右帳記》的記事，是以相阿彌筆(東北大學本)為基礎，隨處參照林左馬衛的相關校勘記事。[35]

《君台觀左右帳記》(以下簡稱《君台觀》)〈土物類〉項不僅記載了足利將軍家藏的各種陶瓷，於各部類陶瓷下方有時還明記了相阿彌以實際價錢來評比鑑賞等重要記事。所載陶瓷種類和價錢包括：【a】曜變(萬疋)(圖1)、【b】油滴(圖2)(五千疋)、【c】建盞(三千疋)、【d】烏盞、【e】鷕盞(千疋)、【f】能皮盞、【g】灰被、【h】天目、【i】青磁茶碗、【j】白磁茶碗、【k】饒州碗、【l】琯瑤。有關上述各類陶瓷的具體面貌和可能的產地比定，日方學者已有許多的討論，並且大都取得相當的共識。即【a】-【c】應是福建建窯系黑釉碗；【e】指的是江西吉州窯蚤斑釉瓷；【f】指吉州窯剪紙漏花作品；【l】是指官窯；【k】為江西白瓷或仿定白瓷；【d】和【g】或來自福建某地仿建窯窯場所生產。[36]雖然《君台觀》陶瓷作品的產地比定有的僅止於推測，但很明顯的是被能、相兩阿彌視為鑑賞收藏對象的陶瓷主要是來自宋代中國南方窯場所生產，並且多屬單色釉瓷。換言之，十五世紀足利將軍家的鑑賞陶瓷是屬於古董範疇，其產地主要來自中國，日本國產瓷則未成為鑑賞的對象。

する一考察〉,《野村美術館紀要》3 (1994)，頁 73-100。

[33] 永島福太郎,〈珠光の茶の湯と京眾〉,收入：《茶道聚錦》2 (東京：小學館，1984)，頁 219。

[34] 佐藤豐三,〈室町殿行幸御餝記〉,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6)，頁 160-168。

[35] 林左馬衛，(校註,《御座敷御かざりの事》,收入：前引《東山御物》，頁 169-197。另外，《君台觀左右帳記》的版本、內容及其與《御餝記》的關係，可參見：林左馬衛,〈《君台觀左右帳記》と《御餝記》の傳記〉,收入：前引,《東山御物》,頁 146-159。

[36] 相關的討論或介紹文章甚多，但敘述的具體內容則大體相同。早期學者的代表性著作可參見：今泉雄作,〈君台觀左帳記考證〉,《國華》39 (1892)，頁 49-51；40 (1893)，頁 73-77。另外，近年赤沼多佳認為「烏盞」亦來自於建窯，但其和油滴等建盞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呈口沿外卷，口部以下斜直內收；內底心較窄的造型。赤沼文見：〈天目再考〉,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周年紀年《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前所述，室町時代各遺跡出土了大量的中國青瓷、白瓷和青花瓷器，然而這些來自中國的貿易瓷雖曾在當時日本區域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積極而重要的角色，就連農村平民或曾犯下殺人罪嫌的中下貧民都擁有可能來自中國的陶瓷器皿(《東寺百合文書》)，[37]但此時輸入的貿易瓷並未受到將軍府同朋眾的青睞，未能成為上層武家鑑藏賞玩的對象。其次，《大音文書》記載十六世紀中期刀彌階層的大音氏財產中有所謂的「天目」黑釉茶碗，[38]而天目碗雖亦見於《君台觀》，然而附記：「つねのごとし、はかつきを上とする也，上には御用なき物にて候間，不及代候也」，[39]可知其時「天目」是與來自福建建陽所產的黑釉「建盞」不同的一種價位低、不入將軍御用的一般黑釉碗。而最高檔次的天目則是被稱為「灰被」(はかつき)者(圖3)，從近年的中國考古發掘資料看來，日方所謂的灰被黑釉碗有一部是來自福建省南平市茶洋窯所生產，[40]推測是輸往日本的意圖做製「建盞」的低價位用器。[41]

此外，就日本的考古資料看來，於十五世紀後期遺跡已見較多的青花瓷器，至十六世紀其數量更大幅增加，成為遺跡出土中國陶瓷的主要種類。而就文獻記載而言，東城坊秀長日記《迎陽記》康曆二年(1380 年)六月九日條已曾記載足利義滿等貴胄赴二條良基邸第舉行「花御會」時，眾人所持花瓶中已包括有「茶垸染付」(ちやはんそめつけ)，即青花瓷瓶。[42]永享九年(1437 年)《室町殿行幸御飾記》亦見屬於青花瓷的「水覆」、「下水」和「茶垸」等少數幾件作品，[43]然而上述文獻記載雖足以說明元末明初青花瓷器確曾輸入日本並成為貴

頁 78-79。

[37] 網野善彥，同註(22)，頁 338-339。

[38] 網野善彥，同註(24)，頁 21。

[39] 《君台觀左右帳記》(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本)；收入：《茶道古典全集》2(京都：同朋社，1956)，頁 314。

[40] 福建省博物館等(林忠幹等)，〈福建南平宋元窯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1983 年 1 期，頁 60 圖 4-1。

[41] 森本朝子，〈博多遺跡群出土の天目〉，收入：茶道資料館，《唐物天目》(京都：茶道資料館，1994)，頁 194-214。

[42] 赤井達郎等編，《資料日本美術史》(京都：松柏社，1989)，頁 159。另，矢部良明，〈元時代の染付とその評價の顛末〉，《古美術》67 (1983)，頁 94-95。

[43] 佐藤豐三，同註(34)，頁 161、163、166。另，長谷部樂爾，同註(7)，頁 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階層使用的用具之一，但相較於《君台觀》所反映之當時對於宋代黑釉盞等單色釉瓷的鑑賞，就顯得微不足道，未能成為鑑賞陶瓷的主要對象。

四、從「唐物數奇」到「侘數奇」

數奇(數寄)一般是指如何掌握眼前所呈現風物的一種對應樣式，[44]而前述《君台觀》所見對於唐物(主要是指來自中國的物品)的絕對崇拜，可說是唐物數奇的具體體現。早在鎌倉末期的知識人吉田兼好(1283-1350年)的《徒然草》中已曾對當時日本盲目地追逐中國物品提出批判；[45]這種唐物趣味至室町時代更是變本加厲，甚至成為一種象徵權威、身分的道具，形成如寬正六年(1465年)《碧山日錄》所說的「多儲錢貨珍器名畫以傲人也」的稱為「婆佐羅」追求溢美物慾的狂熱奢靡風潮。[46]另一方面，我們從文獻所載飲茶用茶碗的種類變化不難發現隨著時代的推移，中國陶瓷茶碗不再是一枝獨秀賞玩的對象，而其間的消長變化正是日本對中國陶瓷鑑賞變遷的具體寫照。以往日方學者最常援用來說明武家貴族從絕對崇尚唐物華美的「唐物數奇」傾向，過渡至賞鑑日本國產信樂窯器(圖4)或南蠻、高麗茶碗(圖5)等粗相陶瓷之美的「侘數奇」，是前引山上宗二(1544-1590年)書於天正十四年(1586年)一般稱為《山上宗二記》的茶道傳書。該書提到：「抬別茶碗之事，唐茶碗ハ捨リタル也，當世ハ高麗茶碗，今燒茶碗、瀨戶茶碗以下迄ナリ」若結合前此數年之永祿七年(1564年)真松齋春溪《分類草木人》之「當時の數奇ハ唐物ハイラヌ樣に成タリ」的記載，就反映出十六世紀後半日本茶道數奇者捨棄來自中國的茶碗，並代之以高麗茶碗和日本國產的樂燒、瀨戶燒等作品，而此一茶道使用道具的變遷也成了部分學者論述其時茶道是以和樣茶具為主流的依據之一。[47]就《山上宗二記》所載陶瓷茶具而言，被《君台觀》評為天下至寶的建窯曜變黑釉碗(同圖1)，成了「代かろき」價值平平與當時侘茶風格格不入的一般作品；同時見於《君台觀》之

---

[44] 小田英作，〈唐物數奇〉，《茶道聚錦》2（東京：小學館，1984），頁130。

[45] 吉田兼好，〈李永熾譯〉，《徒然草》（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85-86。

[46] 《碧山日錄》：「多儲錢貨珍器名畫以傲人也」；《建武式目》：「近日號婆佐羅，專好過差、綾羅錦繡、精好銀劍、風流服飾無不驚目，頗可謂物狂歟」。此轉引自：滿岡忠成，〈室町時代の舶載陶磁〉，《陶磁》11卷2期(1939)，頁1。

[47] 林屋晴三，〈茶陶の變遷－唐物數寄から侘數奇へ〉，《MUSEUM》，335（1980），頁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級低下的灰被茶碗(同圖3)，則被山上宗二視為最能體現冷、瘦、枯之侘茶風，即武田紹鷗(1502-1555 年)至千利休(1522-1591 年)以來茶道美感的名物道具。[48]

就文獻記載看來，永正十三年(1516 年)金春禪鳳著《禪鳳雜談》已提到做為茶道具的伊勢、備前等日本瓷窯作品；[49]現有的《茶會記》雖未能早於天文年間(1532-1555 年)，但天文十八年(1549 年)《天王寺屋茶會記》之《津田宗達他會記》已見使用「伊勢天目」和物茶碗。[50]依據林屋晴三針對主要茶會記和日記類所見茶碗變遷統計資料，則天文二年(1533 年)至天正十二年(1584 年)間的 1264 次茶會使用茶碗例中，唐物、和物茶碗比例為 20:1；但到了天正十三年(1585 年)至慶長末年(1614 年)，其比例則為 4、7:1，[51]說明了日本和物茶碗或高麗茶碗於天正十年代前半急遽流行。[52]然而，和物茶碗的大量使用或流行，是否即近年矢部良明大力鼓吹般的是日本價值體系產生了質的變化，造成十五世紀後半日本茶道世界既利用唐物，同時卻又創造出全然屬於日本的美學觀？[53]以及同氏所主張天正十四年(1586 年)以後，日本的工藝品已掙脫出中國文物的絕對影響，同時奠立體現日本獨特美學的和樣化作品。[54]

雖然十六世紀後半天正年間，足利將軍家等收藏之部分著名唐物茶具，因不符侘茶理念而退出茶會舞台，但從現存的茶會記資料看來，直到桃山時代中國的建盞和天目仍被持續地使用，[55]如收錄於《天王寺屋會記》之永祿九年(1566 年)至元龜三年(1572 年)之津田宗及茶會記，其主要的記述對象也是來自中國的繪畫、茶壺、茶入和青瓷花瓶、香爐等作品，說明唐物道具仍然受到珍

---

[48] 滿岡忠成，〈陶器に現れた紹鷗の美意識〉，收入：《茶道》5，〈茶人篇〉(一)(大阪：創元社，1936)，頁 154-155。

[49] 永島福太郎，同註(33)，頁 217。

[50] 竹內順一，〈和物茶碗の展開〉，收入：《茶道聚錦》11 (東京：小學館，1983)，頁 145-146。

[51] 林屋晴三，〈茶碗變遷資料〉，《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5 (1970)，頁 193-271，另：竹內順一，同上註，頁 143-158 參照。

[52] 竹內順一，同註(50)，頁 146，以及近年谷晃氏的詳細統計，參見：谷晃，〈茶會記に見る中國陶磁の受容〉，《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5 (1996)，頁 38-42。

[53] 矢部良明，〈天正十四年の變〉，收入：日本美術全集 14《城と茶室》桃山　建築、工藝(東京：講談社，1992)，頁 189-196。

[54] 矢部良明，〈桃山工藝論〉，收入：日本美術全集 14 (東京：講談社，1992)，頁 154-161。

[55] 林屋晴三，同註(47)，頁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的事實。[56]晚至萬治三年(1660年)之《玩貨名物記》，甚至平反了被山上宗二所否定的唐物道具，重新賦予較高的評價。[57] 儘管目前學界對於《山上宗二記》的寫作動機仍處於臆測的階段，但很明顯的是，該書內容明白顯示了「雙重構造」，其一是重視足利將軍家以來具有古典美的名物道具，另一則是強調適合當世侘理念的具有粗相美的茶具。[58]無論何者，受到山上宗二高度評價的名物之鑑賞要件，是由形(形態、大小)、比(尺寸、容量)、樣子(整體形態、胎釉外觀特徵和效果等)所構成。[59]其中，有關瓷釉的觀察鑑賞方式，提供了理解當時賞鑑品評陶瓷的重要切入點，值得加以留意。

《山上宗二記》提到，著名歌師心敬(1406-1473年)在觀賞足利義政將軍親自命名為「捨子」的一件中國茶葉壺時，以枯橋覆霜來比擬該褐釉茶葉壺的釉面景致。此壺後歸豐臣秀吉所有，山上宗二實見之後，亦心有戚戚焉地感到壺釉面所呈現出的枯橋如霜般的景色。[60]矢部良明即認為此種體驗冷枯的風情，乃是與世阿彌(1363-1443年？)、心敬等人所倡導的冷、枯、凍、寂意境一脈相承，其構成了具有日本的特有近世美學觀。[61]由於中國地區文獻亦見部分有關瓷釉鑑賞的記事，因此，以下擬以中國文獻為主，隨處比較日本方面的相關記述，嘗試釐清中日兩區域瓷釉鑑賞觀的異同。

五、中國和日本區域的瓷釉鑑賞

如前所述，日本區域十六世紀後半期的瓷釉鑑賞風情，可由《山上宗二記》的記載得以窺見一斑。然而，中國區域又是如何來賞鑑瓷釉呢？

首先，做為中國茶道祖師的陸羽(733-804年)在其《茶經》中，已曾以「類

---

[56] 赤沼多佳，〈《山上宗二記》にみる道具評價とその特質〉，收入：《山上宗二記研究二》(東京：三德庵，1994)，頁36。

[57] 竹內順一，〈《山上宗二記》記載の茶道具〉，《山上宗二記研究一》(東京：三德庵，1993)，頁61。

[58] 此已由竹內順一，同上註，頁110，和赤沼多佳，同註(56)，頁36，所指出。

[59] 竹內順一，同註(57)，頁101。

[60] 《山上宗二記》，同註(2)，頁56。

[61] 矢部良明，〈冷、凍、寂、枯の美的評語を通して近世美學の定立を窺う〉《東京國立博館紀要》25(1990)，頁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玉」、「類冰」和「類銀」、「類雪」來品評、比擬唐代越窯青瓷和邢窯白瓷茶碗的瓷釉外觀特徵。[62]晚唐詩人陸龜蒙(？-約 881 年)《秘色越器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63]杜甫(712-770 年)《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詩》:「君家白碗勝霜雪」，[64]同樣也是以自然界中的「千峰翠色」、「霜雪」來形容青瓷和白瓷的美麗釉色，上述事例似乎顯示其與前引日本室町時代中期著名歌師心敬或山上宗二以枯橋覆霜來譬喻一件名為「捨子」的茶葉壺釉色鑑賞有著類似之處。特別是到了宋代，黃山谷(1045-1105 年)以「赤銅茗椀雨斑斑」來比擬建窯茶盞所施罩的油滴釉，[65]更是對特定陶瓷作品瓷釉的具體賞析。值得留意的是，《君台觀》即視釉色變幻多端的「曜變」建盞為天下之至寶，值錢萬疋；建窯「油滴」黑釉盞次之，值錢五千疋，若以永正八年(1511 年)相阿彌撰《君台觀》時米價一石約七百六十九文來計算，[66]萬疋(十萬文)無疑是個龐大的數字。

另一方面，明初曹昭撰《格古要論》提到建窯「色黑而滋潤，有黃兔毫斑、滴珠，大者真，但體極厚，俗甚，少見薄者」，[67]則受到宋代文人以及室町將軍家同朋眾高度頌揚的建窯油滴、兔毫(圖 6)等瑰麗變幻的釉色，在曹昭看來似乎只是鑑別作品真偽的手段罷了。同樣的，《格古要論》說定窯釉「有淚痕者是真」，[68]也是將定窯白瓷經常可見的流釉痕跡當做判別真偽的要件，而非賞玩的對象。雖然，明代晚期張應文《清秘藏》或文震亨《長物志》注意到定窯

---

[62] 陸羽，《茶經》(台北：藝文，1967)。

[63] 陸龜蒙，《秘色越器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甫里集〉卷 12，冊 1083，頁 355(台北：台灣商務)。

[64] 杜甫，《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 7，冊 1069，頁 797(台北：台灣商務)。

[65] 黃山谷「以小團龍及半挺贈無咎並詩，用前韻為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山谷內集詩注》卷 2，冊 1114，頁 44(台北：台灣商務)。

[66] 百瀨今朝雄，〈室町時代における米價表－東寺關係の場合－〉，《史學雜誌》66 卷 1 期(1957)，頁 65。

[67] (明)曹昭，《格古要論》，收入王雲主編《夷門廣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49，〈古窯器論・古定器〉。

[68] 同上註，頁 48，〈古窯器論・古定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釉有「淚痕者佳」,[69] 說來算是對宋代鑑賞瓷釉景色之某種程度的繼承，然而此種細心咀嚼陶瓷釉色景致變化的觀看方式，在「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70] 晚明文人相對傾向於鑑賞陶瓷紋樣、彩飾的浪潮之下，就顯得微不足道，以至於隆慶六年(1572 年)田藝衡之《留青日札》會將建窯黑釉盞評為等級最低的作品。[71]

這樣看來，中國區域唐宋時代對於瓷釉景色的賞玩風情，似乎並未受到明代鑑賞家多大的認同或繼承，與此相對的，卻於日本區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室町後期至桃山時代幾乎是青出於藍地對唐宋以來的瓷釉賞鑑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其時《道具拜見記》所載裝盛抹茶的小茶罐(茶入)瓷釉鑑賞為例(圖7)，做為名物道具的小茶罐是以雙重掛釉為重要的先決條件，釉面既要具備經常是一道的流釉痕(なだれ)，同時講究流釉先端部分(露先)應逐漸變細流淌至接近罐底，卻又尚未流至罐底處。[72]像這樣的對流釉即淚痕的賞玩風情，極有可能是承襲了宋代的瓷釉鑑賞並予以誇張和形式化的結果。

日本區域對陶瓷釉景的賞鑑，還可從不少茶道具的命名而輕易得知。[73]儘管江戶時代(1603-1868年)的茶具命名原則頗為多樣,有的以持有者或產地因緣來命名，也有依據季節或和歌、漢詩、俳句、禪語、能樂、狂言等來命名，但有許多則是根據作品之器形外觀或釉色變化來給予適當的名稱。[74]由於部分作品仍傳世至今，故有利於經由作品的實物觀察而正確掌握命名的原委和其中的賞鑑風情。如《當代記》慶長十二年(1607 年)載現存的一件宋元時期黑褐釉四繫壺，因器身有一道白色的釉彩，故名曰「白雲」,[75]而實物壺身斜向的泛白

---

[69] (明)張應文，《清秘藏》，收入黃賓虹等編，《美術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7)，初集八輯，頁198：〈論窯器〉，(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美術叢書》，三集九輯，頁226，〈總論銅玉雕刻窯器〉。

[70]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653：卷2下，〈瓷器〉條。

[71] (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下，頁1273。

[72] 竹內順一，同註(57)，頁103-104。

[73] 赤沼多佳，〈茶道具の由來と銘－室町、桃山時代の樣相－〉，收入：《茶の湯の名器－由來と銘－》(京都：茶道資料館，1988)，頁111。

[74] 島村芳宏，〈江戶時代における銘の展開－茶入、花入、茶碗、茶杓を中心に〉，收入：《茶の湯の名器－由來と銘－》(京都：茶道資料館，1988)，頁119-150。

[75] 德川義宣，《茶壺》(京都：淡交社，1982)，圖版6及頁151-152的解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色調窯變煙燻寬帶，的確予人有白雲虹彩的想像(圖8)。其次，南北朝近江守護大名佐佐木道譽秘藏的一件命名為「打曇大海」的中國製褐釉小茶罐(圖9)，也是因罐身波狀的流釉痕而被比擬成懷紙地紋般的雲彩(打曇)，而「大海」則是因罐口沿寬廣如無垠之海而得名。[76]此外，依據《山上宗二記》的記載，原為織田信長(1534-1582 年)所藏，後燒毀於本能寺之變的名為「松島」的褐釉茶葉壺，則是因該壺壺肩上錯落的瘤狀腫塊使人產生島嶼形象的連想，故據此而命名之。[77]至於日本不少中世遺跡都曾出土之繫耳之間飾波形陰刻線紋的宋元時期褐釉四繫壺，則可依據日本天文十三年(1554 年)《茶具備討集》所載：「遠山肩以篦銳畫連山之形也」，得知該類肩飾帷幕式波狀陰刻紋的四繫壺在茶道數寄者之間被稱為「遠山」。[78]

日本區域的這種深入體驗、冥想陶瓷裝飾、器形，特別是釉景色的鑑賞方式，亦體現在茶道茶會記的記錄中。如博多富商神屋宗湛《宗湛日記》天正十五年(1587 年)正月三日條就明記現藏德川美術館名為「松花」的褐釉壺是先掛化妝土而後施釉；[79]天正十四年(1586 年)《山上宗二記》亦記載該壺原為村田珠光(1422-1502)所藏，胎呈黑色調，器身有二瘤，底釉白中帶紅，明確地指出該壺係二次上釉。[80]結合實物所見施釉情況，不得不驚訝桃山時代茶人的細膩觀察力。約成立於十五世紀後半的茶道美學對於化燒窯時的瑕疵為賞鑑的對象、細心咀嚼陶瓷的胎釉風情一事，無疑是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再次回頭考慮中國區域唐宋時代的陶瓷鑑賞，不難察覺其與日本區域的瓷釉景色賞玩趣味，其實頗有雷同之處。如唐皎然(約 760 年前后在世)《晝上人集》以「素瓷雪色縹沫香」來譬喻潔淨的白瓷；[81]宋楊萬里(1127-1206 年)《朝天集》也用

---

[76] 桑田忠親，《名物茶道具の話》，收入：《桑田忠親著作集》(東京：秋田書店，1980)，卷 8，211 頁。

[77] 竹內順一，同註(57)，頁 107。

[78] 謝明良，〈澎湖中屯嶼發現的「清香」銘資片和清香壺〉，《故宮文物月刊》12 卷 6 期(1994)，頁 25。

[79] 神谷宗湛，《宗湛日記》，收入千宗室主編，《茶道古典全集》卷 6（京都：淡交社，1997），頁 164。

[80] 《山上宗二記》，同註(2)，頁 55-56。

[81] (唐)皎然，《晝上人集》，〈飲茶歌誚崔石使君〉，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147，〈皎然集〉卷 7 (上海：商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松風鳴雪兔毫霜」來比擬建窯黑釉盞的釉面景色紋理。[82]

另一方面，宋代文人的這種講究瓷釉「造作的自然」之鑑賞觀也反映在日本區域禪僧的漢詩中。如《無涯仁浩禪詩語錄》所見「青兔毫裏雪花香」即是直接承襲了宋代人對於建窯兔毫黑釉茶盞的賞玩風情，[83]而五山禪僧萬里集九〈啜鷓鴣椀詩〉之「饒州茶椀鷓鴣紋」，甚至有可能是參照黃山谷「建安瓷[illegible]鷓鴣斑」詩句寫作而成的。[84]

無論如何，重要的是約成立於十三世紀鎌倉末期至十四世紀南北朝時代的五山文學是以中國區域漢文化為最高的典範，室町時代五山禪宗僧侶同時也扮演著主宰文化的角色，既為室町幕府起草外交文書，日方朝廷且以禪僧為中介與明國進行外交往來。[85]從《君台觀》將具有瑰麗變幻釉色的建窯黑釉盞視為天下之至寶一事似可推測，室町將軍府的同朋眾在一定程度上是繼承了五山文學的古典鑑賞傳統，而中國區域的唐宋時代文化即為該一鑑賞傳承的最高典範。也因此約略與室町時代平行的明代文物或明代文人的鑑賞觀，並未成為將軍府同朋眾阿彌們參考、汲取的主要對象。

毫無疑問，十六世紀後半日本區域侘茶道具使用和物茶碗或導入來自朝鮮半島的高麗茶碗，並針對室町時代傳世的中國陶瓷予以再評估的新的鑑賞觀，是與武野紹鷗(1504-1555 年)、千利休(1522-1591 年)以來侘茶新的美學理念有關，同時也是對室町時代唐物萬能之僵化現象的一種反動。然而，就瓷釉景色的鑑賞而言，侘茶的鑑賞理念則頗契合做為五山文學典範之中國區域唐宋時代的鑑賞觀。因此，與其將之視為是一種刻意地要和中國區域唐樣相區別、抗衡的和樣鑑賞方式，倒不如將之理解成在同一陶瓷文化圈中，個別區域於發展進程中對於文化圈陶瓷典範的再詮釋，其跨越過室町前期漸呈教條、僵化的由五

---

[82] (宋)楊萬里，《朝天集》，〈以六一泉煮雙井茶〉，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64，〈誠齋集〉卷 20(上海：商務)。

[83] 無涯仁浩(1294-1359 年)。此轉引自：滿岡忠成，《日本人と陶器》(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1945)，頁 112。

[84] 萬里集九，《梅花無盡藏》三の上，明應二年(1493 年)〈啜鷓鴣椀〉詩(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卷 6)可能係做黃山谷詩寫作而成一事，已由滿岡忠成所指出。參見同氏，同註(83)，頁 116。

[85] 田中博美，〈武家外交の成立と五山禪僧の役割〉，收入：田中健夫編，《日本前近代の國家と對外關係》(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 43-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僧侶中介而來的唐宋傳承，而直接去面對、體驗唐宋時代的瓷釉鑑賞風情。其結果是造成了在繼承唐宋時代瓷釉鑑賞觀的同時，進一步地又將體現「造作的自然」的瓷釉風情強調誇張到了極致，從而呈現出一種既和《君台觀》有別，同時又和中國區域明代鑑賞方式大異其趣的具有特色的區域鑑賞觀。

我認為，在考察室町後期至桃山時代日本區域的陶瓷鑑賞典範時，明代嘉靖四十年(1561 年)鄭若曾《日本圖纂》〈倭好〉所載以下的一段記述，很值得重視，即「磁器，擇花樣而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為尚，碗、碟以菊花稜為上，碗亦以葵花稜為上，製若非觚，雖官窯不喜也」。[86] 從現今的考古發掘成果可知，日本不少十六世紀遺跡均曾出土造型呈竹節狀的龍泉窯系青瓷小香爐(圖 10)。[87] 該式爐與定、汝、官等宋代瓷窯常見的弦紋爐有共通之處；現藏德川美術館名為「千鳥」的南宋至元代龍泉青瓷弦紋爐(圖 11)，[88] 可視為明代該窯系所燒造之竹節式爐的祖型。依據松平不昧《古今名物類聚抄》可知「千鳥」銘爐原係武野紹鷗所有，後經豐臣秀吉(1536-1598 年)、德川家康(1542-1616 年)傳世至今，是流傳有緒的大名物，[89] 而十六世紀的竹節式爐即是承襲了類此之宋代弦紋爐造型發展而成的。換句話說，日本區域喜愛的竹節式香爐是繼承宋代造型傳統之具有古典性的器形。其次，《日本國纂》載倭人嗜好稱為「葵花稜」花口碗盤一事更是透露出重要的訊息。眾所周知，著名的名為「馬蝗絆」的南宋龍泉窯青瓷碗最顯著的造型裝飾特徵，即是口沿切割成六花式口(圖 12)。依據享保十二年(1727 年)伊藤東涯《馬蝗絆茶甌記》的記載，該碗原持有人為平重盛(1138-1179 年)，後歸足利義政(1435-1490 年)所有。由於碗心周遭有裂璺，足利義政遂遣人將之攜往明朝欲換取同式完好的作品，然其時中國已不燒造這類陶瓷，權宜之下施以補釘再度送回日本；天文二十三年(1554 年)《茶具備討集》所記載的一件「鋏茶碗，大璺故也」，鋏即補釘，很可能也是指該青瓷碗。

---

[86] 《日本圖纂》，〈倭好〉。原文參見：田中健夫，〈「倭好」覺書－十六世紀の海外貿易品に關する一史料の注解〉，收入同氏，《東アジアの通交圏と國際認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72-174。

[87] 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編，《茶、花、香－中世にうまれた生活文化－》（廣島：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友の會，1995），頁 9 圖 3，福岡市出土。

[88] 根津美術館，《大名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4），圖 34。

[89] 筒井紘一，《名器がたどった歷史》（東京：主婦の友社，1984），頁 25-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⑨⓪無論如何，這件備受重視、充滿浪漫傳奇的南宋龍泉窯花口碗，似乎反映了室町時代對中國陶瓷的品味好尚，即對於花口造型的偏愛。不僅如此，被山上宗二評為天下第一，價值五千貫的松本茶碗，其造型是「ヨウヲ五ツキサシタル青磁ノ茶碗上に吹墨在リ」，即口沿切削成五花式的青瓷碗。⑨①其次，依據武田紹鷗筆錄《往古道具直段付》所記與松本茶碗同列名為天下三大名碗的值錢三千貫之安井茶碗，其造型是「面　ニヘラメ五ツ押入テ有」，⑨②也是屬於五花式口茶碗。

值得留意的是，呈菊花、葵花等花式口沿造型的陶瓷碗盤器皿，於唐代以來各個時代均有製造，明代當然也不例外。不過，明代後期瓷窯碗盤類顯然是以圓口無切棱者為大宗，比較少見具花口造型者。相對的，花式口沿則是唐宋時代各類材質碗盤類之極為常見的裝飾手法之一。從目前中國區域的考古發掘資料可知，五花式口碗盤，是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流行的裝飾技法，北宋晚期至南宋則多呈六花式口。⑨③就此而言，做為山上宗二時代天下名碗的碗式，應該說是比較接近北宋晚期以前的樣式。

此外，明崇禎十年(1637 年)宋應星《天工開物》載日本不惜以巨資收購可能是屬於宋代官窯類型的碎器香爐，⑨④以及日本遣明副使著名禪僧策彥周良於嘉靖十九年(1540 年)渡明時購買宋代定窯白瓷一事，⑨⑤亦可反映十六世紀中期日本區域追逐宋代趣味的時代風尚。特別是策彥周良於明朝不止一次地購買「白菊皿」，⑨⑥目前已有許多資料可以証實，這種白菊皿應該是與博多上吳服町或島根縣廣瀨町等十六世紀遺跡出土的口沿呈菊瓣造型的白瓷小碟同類的作品

---

⑨⓪ 奥田直榮，〈東山御物〉，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6)，頁 106-107，另同書圖 35。

⑨① 《山上宗二記》，同註(2)，頁 63。不過，亦有學者懷疑所謂松本茶碗或許屬朝鮮陶瓷，此說參見：谷晃，〈茶會記に見る朝鮮陶磁の受容〉，《野村美術館紀要》4 (1995)，頁 45，註(24)。

⑨② 滿岡忠成，同註(46)，頁 11。

⑨③ 矢部良明，〈晚唐五代の陶磁にみる五輪花の流行〉，《MUSEUM》300 (1976)，頁 21-33。

⑨④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香港：中華書局，1978)，頁 199。

⑨⑤ 牧田諦亮編，《策彥入明記の研究・上》(京都：法藏社，1995)，頁 155：「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條。

⑨⑥ 同上註，頁 192，「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條；頁 193：「同年五月二日及三日」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3）。[97]值得一提的是，該式碟不僅是宋代金銀器、漆器常見的器形，同時也是南宋官窯的造型樣式之一（圖 14）。[98]此再次說明了日本的花口趣味之古典性格。

六、結　語

就日本區域的茶道發展史而言，流行於室町時代（1359-1573 年）前期北山和東山文化的書院茶，至室町後期已逐漸為講究侘茶風的草庵茶所替代，「號唐樣餝室集眾催興之宴」（《禪林小歌》），[99]武家貴族書院茶以中國區域唐宋時期工藝美術品為裝飾道具的風潮，也隨著草庵茶的興起和風行，中國文物不再是一枝獨秀的賞玩對象。如室町後期著名茶師武野紹鷗所使用的茶具中，除了中國陶瓷之外，亦包括部分朝鮮半島、東南亞和日本國產的信樂、備前等瓷窯作品。[100]換言之，此時的文物鑑賞已從武家貴族崇尚華麗唐物的「唐物數奇」傾向，過渡至賞鑑信樂、高麗或來自中國福建地區雜窯的灰被茶碗等粗陶瓷美的「侘數奇」[101]了。十六世紀末期《山上宗二記》的茶具觀即是集中反映了侘數奇的賞玩風情。

雖然，十三世紀鎌倉時代末期至十四世紀南北朝時代的早期五山文化或五山僧侶對於中國工藝品的鑑賞傾向，或曾給予室町時代「唐物萬能」風潮一定程度的影響。不過，室町將軍在賞玩來自中國區域唐物的同時，還刻意地將唐物做為展現威權的格式道具一事，則頗耐人尋味。[102]而該一現象是否可能透露

---

[97]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都市計劃道路博多駅築港線關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 I》，博多、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183 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1988），卷頭圖版 3 之 5 之 124-128。

[9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4），圖 58。

[99] 聖岡，《禪林小歌》收入：《續群書類從》19 輯，〈遊戲部〉，卷 561，頁 1167。另據中尾萬三考證其成書年代約在應永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415-1420 年）之間。參見中尾：〈天目茶碗考〉，《陶磁》8 卷 3 期（1936），頁 10。

[100] 滿岡忠成，同註（48），頁 151-165。

[101] 村井康彥，〈茶の湯の成立と侘茶への胎動〉，收入：《茶道聚錦》2（東京：小學館，1984），頁 49-59。

[102] 龜井明德極力反對在未加詳細論証之前，就冒然地將將軍家持有的中國陶瓷視為展現威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室町前期絕對尊崇中國文物的深層原因，或者提供我們理解隨著區域的變動而可能衍生出的文物鑑賞或價值觀的變化等重要線索？值得略加探討。

永享九年(1437 年)能阿彌《室町殿行幸御餝記》(以下簡稱《御餝記》)，是記錄了六代將軍足利義教(1429-1441 年)執政時室町殿(花御所)庭院南北會所中的裝飾道具內容和陳設情況。如做為主體的南向會所之「西七間」懸掛有南宋玉澗的《八景圖》; 北向會所泉殿「赤漆之床間」置饒州「湯盞」等等，[9]其陳設文物內容明顯地反映出對於唐物的憧憬。值得一提的是，會所展出之道具乃是為了因應御花園天皇之行幸而設的。也可以說代表武家政權的將軍似乎是擬借由此次天皇之行幸，向做為公家政權最高位的天皇展現誇耀其所擁有的大量唐物道具。

眾所周知，自足利義滿(1358-1408 年)就任第三代將軍以來，公家和武家兩政權的關係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其時朝廷原本擁有的諸種權力大多逐漸轉移至幕府，幕府將軍在實質上已居於日本最高統治者的地位，應永九年(1402 年)中國明惠帝在國書中稱義滿為「日本國王源道義」也表明了該一事實。歷來的日方學者對於實際上已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義滿為何要以臣屬之禮與明國建交有過許多的討論。[10]其中，又以佐藤進一的說法最常為學界所引用。佐藤進一認為義滿篡奪王權的計劃是經由與明國建交，獲得日本國王之稱號而得以完全地實現。同時，與明國的朝貢貿易也保証了義滿在日本區域經濟貿易方面的統治權力。[11]近年，[12]田晴子在考察足利幕府始終不頒行貨幣，而是由中國進口銅

之道具的做法(龜井，〈貿易陶磁器研究の今日的課題〉，收入：前川要編，《中世總合資料學の提倡－中世考古学の現狀と課題－》(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頁 246-248)。我也認為近年日本學界動輒以所謂「威信財」來解讀遺跡出土中國陶瓷的做法確實有過當之處，如小野正敏，〈威信財として貿易陶磁と場—戰國期東國を例に〉，收入：同氏等編，《戰國時代の考古學》(東京：高志書院，2003)，頁 553-564，即為其中的代表。但是我們也不應矯枉過正。就將軍家收藏的「唐物」而言，我認為應先將之區分為：(1) 經由一般貿易途徑或臣下進奉而獲得；(2) 明朝帝王的賞賜品。前者屬異國珍奇土產品，後者則具有威權格式道具的象徵意涵。

[9] 《室町殿行幸御餝記》，見同註(34)，頁 160-168。

[10] 田中健夫，《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第二章，〈冊封關係の成立〉，頁 53-94 參照。

[11] 佐藤進一，〈室町幕府論〉，收入同氏《日本中世史論集》(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時也指出，義滿雖貴為日本實質上的最高統治者，然而在名義上天皇才是至上的存在，將軍既是由天皇所任命，故貨幣的發行權理應歸於天皇所有，因此義滿援用中國貨幣之舉，其實是採取了與日本國王封號同樣的策略。⑪這樣看來，將軍家的唐物趣味及其所擁有的大量中國文物，就有可能是日本國王封號策略思維下的另一種展現的方式；不難想像經由朝貢的形式由中國皇帝賜予的中國文物是有著重要的象徵功能。

事實上，《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記載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 年)曾頒賜予足利義滿將軍「黃銅鍍金廂口足建盞一十箇」，⑫即十件口沿和底足鑲嵌鍍金金屬釦邊的建窯黑釉茶盞，而凡事以義滿為模範的六代將軍義政於永享九年(1437 年)御花園天皇行幸時，也在會所展示了「建盞」和「油滴」。其中，陳設於南向會所「茶湯棚」的建窯，還鑲有銀白色的金屬釦邊。⑬儘管目前已難得知上述建盞當中，是否包括了部分永樂帝的頒賜品？不過，若將《御餝記》所載中國文物內容，與中國皇帝贈予日本國王的中國物品進行比較，未必不能勾勒一個概略的輪廓。如前引《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載永樂元年(1403 年)成祖頒賜日本國王妃禮物中有紅雕漆「八角盆」；永樂四年(1406 年)賞賜日本國王源道義的禮物除了「建窯」之外，另有「黃熟銅大菱花盆」、「黃熟銅小清面盆」和「硃紅漆戧金彩粧衣架」等，⑭而《御餝記》亦載錄有堆紅盆、剔花盆和「衣駕」(原注：唐赤漆彫物荔枝紅綠。以下品名之後括弧均為原注)和「清面缽」(鈆石菱花)；⑮而後者之銅質菱花盆形制恰與成祖頒賜的「黃熟銅大菱花盆」完全一致。其次，相國寺瑞溪周鳳(1391-1473 年)著《善鄰國寶記》收錄的宣德八年(1433 年)宣宗特賜日本國王和王妃的禮品中有：「硃紅漆戧金交椅」、「銀茶瓶」、「鏡袋」、「古銅點金斑花瓶」、「古銅點金斑香爐」和「兔毫筆」等。⑯與此相

115-164。

⑩ 田晴子，〈物價より見た日明貿易の性格〉，收入：宮川秀一編，《日本における國家と社會》(京都：思文館，1992)，頁 259-260。

⑪《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收入：湯谷稔編，《日明勘合貿易史料》，(東京：國書刊行會，1983)，頁 453。

⑫《室町殿行幸御餝記》，同註(34)，頁 160-168。

⑬《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同註(106)，頁 446-453。

⑭ 《室町殿行幸御餝記》，同註(34)，頁 160-168。

⑮ 田中健夫編《善鄰國寶記　新訂善鄰國寶記》(東京：集英社，1995)，頁 210-2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應般，《御餝記》亦載錄有「椅子」(朱漆)、「茶瓶」(大小二銀一)、「鏡袋」、「水瓶」(胡銅)、「香櫨」(鈗石)以及「筆」等物品。⑬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國王除了收受中國帝王頒賜的禮物之外，有時還以「奏討」的方式，具體請求中國皇帝賞賚國王所需之物件。如同樣收錄於《善鄰國寶記》之景泰五年(1454年)正月初玖日國書，即記載有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向景帝奏討並獲准頒賜的「黃銅花龜鶴燭台」，⑭參照《君台觀》義政小河殿所裝飾道具插圖(圖15)，則該龜鶴銅燭台無疑就是陳設於小河殿東御殿對面所桌上之鶴首頂端載承盤，鶴足踏於龜背上的象生燭台，其與花瓶和香爐共同構成了「三具足」裝飾。⑮而《御餝記》所見之「三具足」(龜鶴　圓明)，⑯很有可能亦屬該一形制的龜鶴形燭台。無論如何，從將軍家的裝飾道具與中國皇帝頒賜品內容有頗多重疊或雷同之處一事看來，室町將軍家的崇尚唐物之風很可能又與明代的冊封體制有關，而做象徵將軍權力的中國區域工藝美術品也成為武家上層貴族追逐、賞玩的主要對象之一。從《君台觀》或《御餝記》所載中國區域工藝美術品的所屬時代看來，此時日本區域所憧憬的唐物有不少是屬於唐宋元代的古物。除了明記有作者名號、年代的繪畫作品之外，與前述龜鶴形燭台造型特徵基本一致的倣漢代燈式銅燭台曾見於四川省簡陽縣東溪園藝場或江油縣宋代窖藏出土品(圖16)。⑰至於屢次出現的「建窯」黑釉茶碗無疑亦屬宋代文物。從《萬曆大明會典》載成祖賜日本國禮物中包括「古器、書畫等物」，⑱亦可窺知永樂皇帝對於此時日本區域嗜愛中國古物一事可能已有某種程度的理解，也因此才會出

---

⑫《室町殿行幸御餝記》，同註(34)，頁160-168。

⑬ 田中健夫編，同註(110)，頁232。

⑭《小河御所并東山殿御餝記》，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6)，圖44。

⑮《室町殿行幸御餝記》，同註(34)，頁161。

⑯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張才俊)，〈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元墓〉，《文物》1987年2期，圖版捌之一。黃石林，〈江油縣發現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2期，封底圖11。附帶一提，目前學界對該遺跡之年代和性質仍存在有不同的意見，筆者是傾向其應屬宋代窖藏，而非元代墓葬的看法，相關討論可參見：謝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154-155。

⑰《大明萬曆會典》，〈給賜二〉，「日本國永樂間賜國王冠服、紵絲、沙、羅、金銀、古器、書畫等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這樣的特殊賞賜品。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明朝帝王賞賚給日本國王的文物在安土桃山時已有部份留入民間。成書於天正十四年(1586 年)的《山上宗二記》已曾記載堺之滿田盛秀收藏有一件「コンネン殿」青瓷茶盞，⑯而此一口沿切割成六花口的青瓷碗也就是見於《久政茶會記》天文十一年(1645 年)條之「坤寧殿茶碗」。⑰應予留意的是，儘管當今學界主張「坤寧殿」是今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北側殿名，原係明初增建的皇后居宅，後因火災燒失再建而成，⑱殊不知清代乾隆皇帝不僅已曾提及內府所藏器底刻有「坤寧」的宋代官窯，並對此進行了考証。乾隆帝認為：「按今之坤寧宮沿明之舊，而陶宗儀《輟耕錄》記宋官殿已有坤寧殿之名，此器中坤寧不知刻於何時矣」。⑲無論如何，坤寧殿既為宮廷殿名，刻有坤寧字銘者無疑亦屬內廷文物。儘管我們已難証實《山上宗二記》所載之坤寧殿茶碗是明朝帝王賜予日本國王的賞賚品，不過英國大衛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也收藏有一件 1920 年代由大衛德爵士直接購自慈禧太后抵押給鹽業銀行的宋代建窯黑釉盞，盞底於燒成前刻「寶」字，燒成後另加刻「坤寧殿」和「和適」字銘。⑳(圖 17)有趣的是，前引《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即記載了明成祖永樂曾賜予足利義滿將軍建窯黑釉盞，因此不排除日本茶會所見「坤寧殿茶盞」原本來自明代帝王的贈予。

另一方面，如果仔細觀察部分宋元時期墓葬出土器物的組合情況，㉑似亦不難得知室町時代以來流行的「三具足」、「五具足」之裝飾構思，很可能也是來自中國祭台的陳設擺置。而所謂「五具足」之於中央置香爐，兩側分別配以

---

⑯ 山上宗二，同註(2)，頁 63-64。

⑰ 《久政茶會記》，收入：《茶道古典全集》9，(京都：淡交社，1997 年版)，頁 5。

⑱ Margaret Medley,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and Allied Wares* (University of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0), pp. 36-37。

⑲ 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官窯碟子二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⑳ Rosemary E. Scott, ロズマリー・E・スコット，〈パーシヴアル・デイヴイッド・コレクションの中國陶磁〉，收入《中國陶磁の至寶 英國デイヴイッド・コレクション》(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1998)，頁 119。

㉑ 金琦，〈南京市郊區龍潭宋墓〉，《考古》1963 年 9 期，頁 344-345；大同市文物陳列館等(解廷琦)，〈山西省大同市元代馮道真、王青墓清理簡報〉，《文物》1962 年 10 期，頁 34-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對燭台和花瓶的陳列方式，亦即中國俗稱的「五供養」也可於著名的萬曆定陵⑫或福建明代墓葬出土祭台上的陳設器物得以窺見得知。⑬

雖然，日本區域的唐物趣味和陶瓷鑑賞觀至室町後期已有所變化，但就文化圈區域的觀點而言，筆者礙難同意室町後期至桃山時代之於陶瓷的賞玩風情或理念，是一種要刻意和中國區域進行區別、相抗衡的鑑賞觀。侘茶道的開山宗師，奈良稱名寺僧村田珠光(1423-1502年)書予古市胤澄的茶道秘籍《心之師的一紙》(《心の文の一紙》或《心の文》)提到：茶道最重要的是要消弭和漢的區隔而將兩者融合為一，因為茶道的真髓是在體驗和物以及唐物茶具之美的基礎上與心相結合的藝術，其絕非如部分茶道初學以為使用了備前等和物茶碗即能登堂入室，到達茶道的最高境界。⑭以侘茶的系譜而言，武野紹鷗(1504-1555年)是從珠光門人修習茶道，而侘茶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1年)是學自武野紹鷗，至於山上宗二(1544-1590年)則是師承千利休並以千利休的衣缽傳人自居。因此，《山上宗二記》所說「摒棄唐物」一事，也應該以珠光以來的侘茶精神脈絡來予以理解。也就是說，山上宗二的該一主張可能只是意圖矯正自室町前期以來對於唐物之盲目崇拜風潮。事實上，就在《山上宗二記》成書後翌年(1587年)豐臣秀吉於大阪城舉行的茶會所用茶具和裝飾道具即是以唐物為主。⑮因此，在山上宗二所處的時代之茶道精神亦如珠光一般，也是要先能鑑別並有所選擇地使用具有侘趣味的茶道具，其重點並不在於區別和漢道具或強調日本區域「和樣」與中國區域「唐樣」的不同。

（本文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補助《東亞藝術文化圈之交融與分化：十五、十六世紀中日藝術交流之研究》專題研究計劃之部分成果）

（責任編輯：廖佐惠）

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版214。

⑬ 馬春卿，〈福州市西門外張都山發現明代墓葬〉，《文物》1955年11期，頁131圖4。

⑭ 熊倉功夫等編，《史料による茶の湯の歴史》(東京：主婦の友社，1994)，頁212-215。另可參見：赤沼多佳，〈"和漢のさかいまぎらかす"唐物數寄、和物數寄一考〉，《日本の美學》9(1986)，頁87-93。

⑮ 神谷宗湛，同註(79)，頁158-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文獻出處

圖 1　《伝えられた名寶 美の繼承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2002)，圖 28

圖 2　《茶道聚錦》11（東京：小學館，1983)，圖 4

圖 3　前引《茶道聚錦》，圖 10

圖 4　前引《茶道聚錦》圖 191

圖 5　前引《茶道聚錦》圖 69

圖 6　前引《茶道聚錦》圖 9

圖 7　《茶入》(東京：根津美術館，1978)，圖 1

圖 8　《茶壺》(東京：德川美術館等，1981)，圖 4

圖 9　《原色茶道大辭典》(京都：淡交社，1975)，頁 98

圖 10　《一乘谷遺跡》(東京：至文堂，1984)，圖 68 頁 130

圖 11　《大名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4)，圖 34

圖 12　前引《茶道聚錦》，圖 26

圖 13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東京美術，1978)，頁 86 圖 310、311

圖 14　《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4)，圖 58

圖 15　《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等，1976)，圖 44

圖 16　《文物》1987 年 2 期，圖版捌之 1

圖 17　《中國陶磁の至寶 英國デイヴイッド・コレクション》，圖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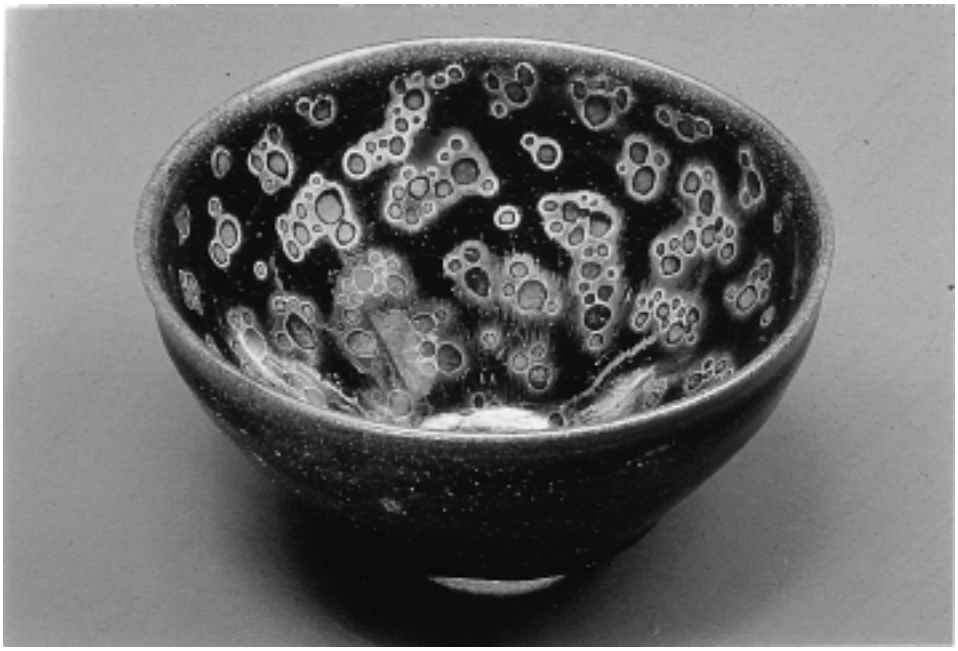


圖 1　曜變建盞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圖 2　油滴建盞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 3　灰被茶盞　永青文庫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　道入「稻妻」銘黑樂茶碗　不審庵藏



圖 5　大井戶茶碗(喜左衛門井戶)
孤篷庵藏



圖 6　兔毫建盞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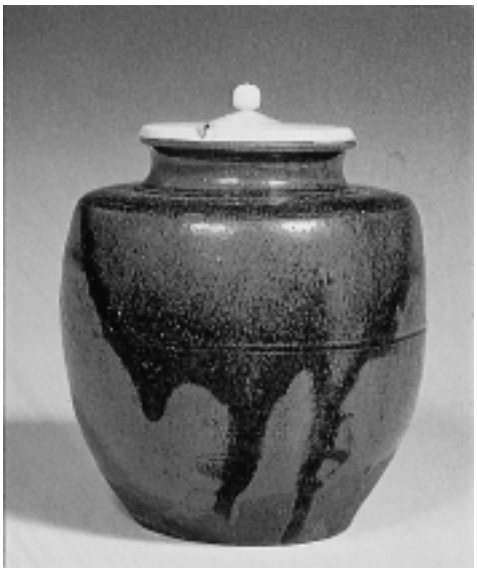


圖 7　「初花」銘茶入　德川宗家藏



圖 9　「打曇大海」銘茶入　東山御物



圖 8　「白雲」銘　茶[illegible] 柳[illegible]御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0　日本福島縣一乘谷遺跡出土明代香爐



圖 11　南宋—元「千鳥」銘
龍泉窯青瓷弦紋爐
德川美術館藏



圖 12　南宋 「馬蝗絆」銘　龍泉窯青瓷花口碗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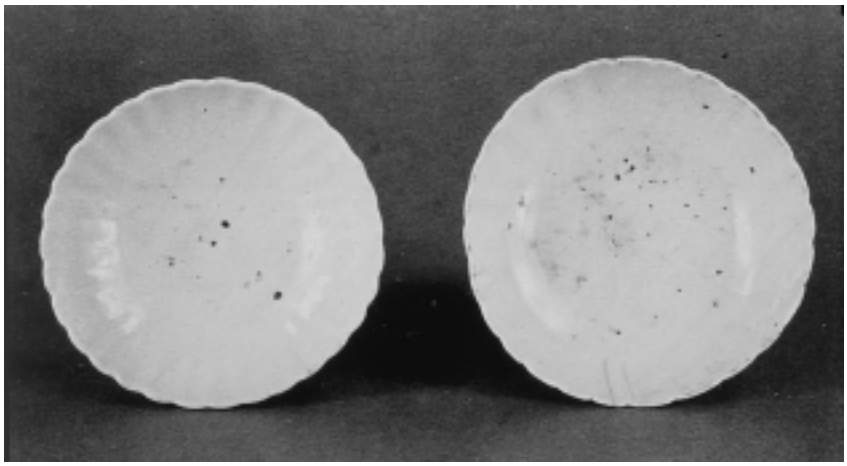


圖 13　明代白瓷菊瓣盤　日本島根縣能義郡廣瀨町富田三太良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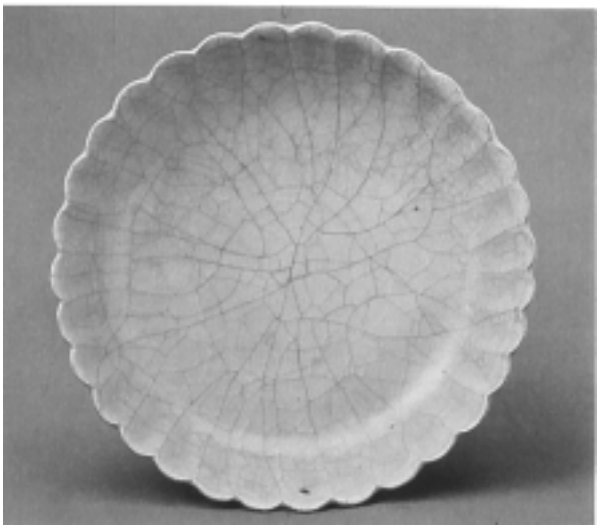


圖 14　南宋官窯菊瓣盤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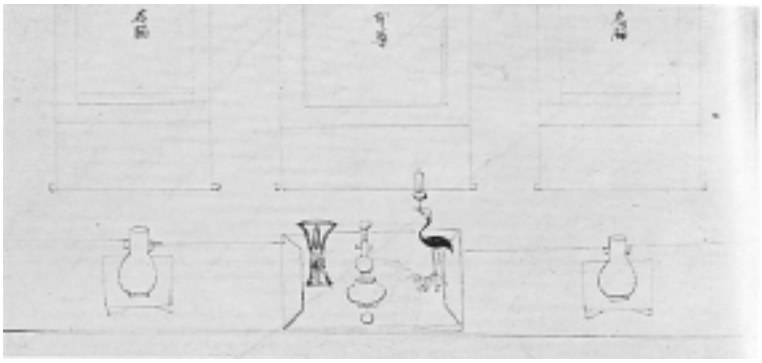


圖 15　《小河殿所並東山殿御餝記》所見龜鶴燭台



圖 16　銅龜鶴燭台
四川省簡陽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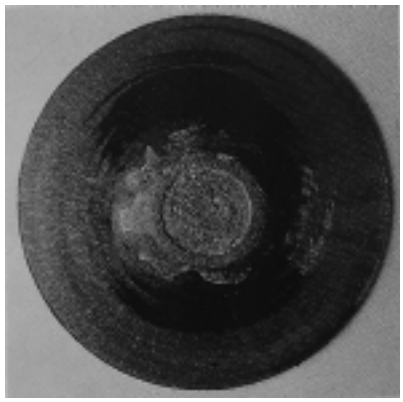


圖 17　「坤寧殿」刻款宋代建盞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